

能源消费经济学的发展视角：习惯的关键作用

Kevin Marechal 著，孙宁译

原载：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XLIII, No. 1, March 2009

内容摘要：气候变化不仅要求我们改变生产和能源转换的方法，还要求我们调整能源消费的格局。大量的研究文献表明，我们的行为通常是受习惯约束的。习惯——这是一种非完全意识的行为方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与理性的选择理论相悖。消费者在受到某种促销激励时，期待他们节制对能源的消费是很困难的。因此，面对习惯，我们需要建立新的工具。现行的基于碳的社会-技术系统，通过结构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制度的力量来限制和培养消费者选择的观点，增强了工具的性能。由于习惯是潜在的“反意图的”行为，所以习惯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行为的锁定形式，从而可以用来解释能源消费持续增加的现象。因此，政策须解决的具体问题应是习惯表现的环境。

关键词：习惯；发展经济学；能源消费；锁定

一个多世纪以前，Thorstein Veblen 写道，“同时，除了环境迫使的改变，人们已有的思维习惯是无限度地延续的。因此，这些代代相传的制度、思维习惯、观点、精神状态和敏悟等等，本身就是一种保守因素，是由社会惯性、心理惯性以及保守主义构成的。”（Veblen, 1994）。

至少我们可以说，Thorstein Veblen 的著作对那些有志于对气候变化问题（经常被认为是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所面临的最具挑战的问题）进行经济学分析的人而言，是一种启发。有两个不同的因素可以让我们对 Veblen 的贡献做出这样的评价。第一、由于强调历史性及历史所包容的广泛的制度和社会环境，Veblen 堪称是一个尝试由 David（1985）和 Arthur（1988）开辟的“路径依赖理论”方法的先驱者；第二、正如文章开头的那句引语所阐述的那样，Veblen 的分析提出了一个观点，即：每个人所具有的习惯和行为都是由他的经历规定的。（Veblen, 1990）。习惯的这种概念为建立分析框架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出发点。在指导气候和能源决策时，理性选择模式显然产生了误导，而基于习惯的分析框架则摆脱了理性的选择模式。

为延伸这一语境，本文进一步探索习惯在能源消费领域中的作用，同时将关于习惯的各种洞察力整合为一个更宽泛的、具有发展目光的能源经济学观点。这个观点就是要说明，上述 Veblen 的两个因素是相互关联、相互强化的。因此，本文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个习惯发展的清晰画面，并说明习惯对维持以矿物燃料能源为基础、具有不可推卸的“锁定”性质的社会-技术系统所具有的作用。

论文的第二部分根据对“效率悖论”一词的解释，概述关于能源消费主流经济分析的重大问题；第三部分描述用于习惯概念分析的宽泛发展框架；在第四部分，笔者说明在研究能源消费时考虑习惯的重要性，以及习惯对宽泛框架的适合性；在第五部分，我们尝试给习惯一个功能性的定义；最后一部分作为结尾，考察在能源消费领域中克服非可持续性习惯的各种方法。

一、关于能源消费的主流经济学分析和效率“悖论”

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有明显的关系，这一点已经得到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近报告（2007）的证实。这就亟需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向低碳经济的过渡（Stern, 2006 年）。考虑到能源排放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占重大比例，这种经济转型不可避免地要求我们不仅要改变生产和能源转换方式，而且要改变当前人类能源消费的格局。

由于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能源消费一直被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受到关注，因此各国的能源政策重点是提高能源效率而非能源转换（Wilhite 等人，2000 年；Harris 等人，2007 年）。虽然提高能源效率不失为降低能源使用的方法之一，但仅仅关注“开发”更有效的技术、维持非可持续的消费格局，其结果势必是反生产率的。著名的“反弹效应”就是这种反生产率的例证。

将提高能源效率作为解决由能源引起的诸如全球变暖这样的环境问题的方法，显然与当下流行的“技术乐观主义”有密切关系。技术乐观主义认为：未来的技术能够向消费者提供更有效的能源使用方法，因此也可以解决环境问题（Wilhite 等人，2007 年）。这种观点把能源效率本身当作目的而非手段（即：只关注能源使用的减少）。

然而，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即在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理性选择”模式。首先，正如 Marechal（2007 年）提出的那样，效率的概念将人的属性简化到只保留人的机械特性，而且是主流经济学固有的关注点（Hodgson, 1993; Foster, 1997）。的确，主流经济学的范式——即著名的“经济人”理念——是建立在笛卡尔的大脑皮层的左半部（专门从事分析和计算功能）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之上的，因而解释了为什么在“新古典经济学派占核心地位”的效率反而有损于效力这个“根本的经济命题”。在新古典经济研究议事日程中根本没有涉及效力问题（Dopfer, 2005）。更进一步说，基于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中“代理人”概念的、简单的聚集规则的内涵是：宏观经济学“从分配和制度问题稳步地转移到几乎只关注市场效率问题上来。”（van den Bergh, Gowdy 2003）。

其次，这个完美的理性原则使任何与能源需求有关的问题都显得微不足道，理所当然。根据这个原则，能源问题研究的目的是为经济代理人提供正确的信息，说服他们为提高能源效率的措施投资。换句话说，理性选择模式只是为决策者“过度地依赖‘刺激’措施来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灵丹妙药”（Hayes, 2007），为政策制定铺平道路。

关于“无悔”减排潜力或称“效率悖论”的争论也涉及能源政策。例如，一开始主流经济学家极力否定对能源效率盈利的投资还存在未开发的潜力，可是后来，他们却求助于导致错误市场信号的“市场失灵”的传统观点。因此，他们告诉决策者，要纠正这些失灵必须提供明晰的激励措施，其中“制定正确的价格”、“提供准确的信息”、以及“提供资金的便利”成为最常用的手段。

实验性研究发现的情形并不像经济学家想象得那样简单，盈利的能源效率投资除了市场失灵外，还面临其他的障碍。被大部分能源经济学家忽略的非经济性障碍也是重要的原因。如果决策者希望开发“无悔”减排潜力的话，就需要实施更多的政策。

假设对效率的关注和“过分依赖刺激”在降低能源使用上失效，有人建议换一种分析框架可以带来一个更具远见的方案。既然“效率-刺激”观点所依据的主流经济学理性选择模式受到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的强烈质疑，那么我们也只能这样做了（见 Gowdy, Erickson 对最近批评的概述，2005）。正如 Jackson（2005）对可持续消费的深入考察所显示的那样，理性选择模式中的三个主要假设：理性、个性和自利，都受到了挑战。

比如，有大量的实验文献表明，自利和理性的经济人在现实中并不真地存在（Fehr 和 Gächter, 2000; Henrich 等人，2001 都提供了大量的经济人的实际经济行为的实验文献研究）。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在“新经济学”领域里的观察研究结果也表明：经济决策的某些部分是受感情支配的，因而也具有感情色彩。（Camerer 和 Lowenstein, 2004）

毋庸置疑，经济人行为分析与能源消费分析一样，都应该完全承认这种实验证据（即对这种异常现象的观察）。

二、对发展分析框架的描述

假设经济学是沿着“文化熔炉铸就的某种标准范式”发展的，而我们的思想也是最先在这个大熔炉中糅和的（Perlman 和 McCann, 1998），那么，经济学一定也受统治牛顿时代的机械科学氛围的影响。如 Foster（1997）所宣称的那样，牛顿/笛卡尔的精神遗产留给我们的的是一个线性的、与历史无关的经济学范式，因为它没有“描述历史的整个进程”。总之，牛顿/笛卡尔对经济学的影响引导出一个可称之为“机械降低主义”模式（Marechal 等人，2008）。

承认这一点并牢记在心的一个事实是，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人行为的核心假设与实验证据相左（Dopfer, 2004），选择一种具有发展观的思路则可一目了然。一方面，在解释经济人为什么并不能总是像机器那样准确有效时，具有发展思路的经济学纠正了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科学的失败”。按 Herbert Simon 的“束缚的理性”的说法，经纪人是通过采纳“例行公事”式的决策

方法来简化决策过程，确保得到满意的结果的（Nelson 和 Winter，1982）。另一方面，经济学发展框架的另一个基石是激进地对经济变革实施多种干扰。具体地说，多 Dopfer（2004）曾宣称，主流经济学中的外生“包含了发展经济学的内生核心”。如果关注的焦点是产生于创新、选择和积累的经济动力，那么发展经济学就为环境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真知灼见（van den Bergh 等人，2006）。分析表明，在脱离完美的理性假设的同时，关注焦点转向对经济动力更深入的理解，使得发展经济学在制定可持续能源消费政策时获得一个必要的理论依据。

与上述的 Veblen 的累积因果关系和 Hodgson 的最近经济研究逐渐向“降低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转变的结论相一致，我们的研究方法强调，与流行于主流经济学中的决定论的、线性的观点相反，经济变革应该被界定为是一个累积，是双向和互动的因果关系过程（van den Bergh 和 Hodgson，2003；Corning 1997；Hodgson 1997）。

组群层面的分析方法能够非常深刻地分析能源消费。正如我们将要说明的那样，借助一个允许循环和经纪人之间自我强化的互动分析框架，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方法。换言之，这个框架将消费动力分析包含了个人与人口自然增长之间自我强化式的互动过程。

在这种语境下，经济变革的发展分析视角所产生的附加值强调了历史的或有性质（因为因果关系是累积的），突出系统的相互依赖作用（因为因果关系是双向和互动的）。正如 Veblen 所举的英国小型马车的例子，系统的相互依赖性就是指技术不是孤立的，是属于一个技术系统的。这种系统的定义是“连接于一个网络中的相互关联的部件，或容纳了物质、社会和信息元素的基础设施。”（Unruh，2000）。由于技术之间相互依赖，而且与导致它们共同作用的、更广阔的文化、组织和制度环境相联系，我们可以用 Geels, Kemp（2007）所称的 *社会技术系统*（STS）或 Unruh（2000）所称的 *技术制度综合体*（TIC）来命名。汽车产业的扩展可更好地说明。汽车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其他支持产业（钢材、玻璃等）、基础设施（加油站、道路等）以及学术研究和游说的同步发展（Flink，1970）。

社会技术系统所具有的这种各种要素之间的交织依存特点，凸显了该系统的潜在惯性。的确，一旦历史条件引发社会技术系统的出现，它的多元因素会以一个自我强化的方式促进系统的稳定。因此，社会技术系统的性质和类型取决于发展路径，并通过系统中多元因素之间的互动不断延续。正面的反馈就像滚雪球，遵循一个路径依赖共同发展过程，最后锁定为一个嵌入的社会技术系统。根据 Puffert（2000）的定义，路径依赖过程是“一个特定意外事件——不仅仅是像技术偏好、要素禀赋和制度这样的根本决定因素——对分配的后续过程所产生的持续效果的过程。”这个观点对解决能源问题至关重要，理由至少有三：

首先，如 Grubler 认为的那样，人类历史的最后两个世纪主要是由三个连续的社会技术系统支撑，每个系统都以一种能源为基础。从 1800 年至 1870 年，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技术系统由蒸汽、铁矿和运河构成；1850 年至 1940 年，社会技术系统逐渐被煤炭、铁路、钢铁和工业电气化所取代；在 1920 年至 2000 年期间，社会技术系统转变为由石油、公路、塑料和大规模电气化构成。

其次，Shove（2004）还注意到，如果技术嵌入在一个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社会制度环境中，那么消费的形成取决于（同时也塑造了）技术限制。

其三、既然某种社会技术系统（诸如目前基于碳的技术系统）的出现被认为是历史的偶然，那么它就不再被看成是仅仅受最佳选择的控制。正如 Paul David 在关于标准打字机键盘左上角的六个字母 QWERTY 设计分析的先驱性论著（David，1985）中所称，某种社会技术系统可能是建立在技术的某个瑕疵（设计）之上。由于很难找到反驳瑕疵设计的有力证据，因此对这个假设学术界仍争论不休。然而，实验证据给我们的启示是：绝不要忽略这种假设

（见 Cowan 1990 年收集的关于光水反应堆证据；Scott 2001 年关于英国铁路系统在小型马车系统中的锁定）。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幸运地获得了足够的科学证据，它们证明气候变化是由温室气体排放累积造成的，在无须讨论系统潜在的技术瑕疵的情况下，我们仍可以找到摆脱目前基于碳的社会技术系统的途径。

三、关于能源消费的发展观点：“习惯”的重要性

正如 Marechal (2007) 所详细描述的那样, 透过发展的视角考察能源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把问题看得更清晰, 从而拓宽该领域当前的决策思路。比如, “束缚的理性”这个概念对解释上述的能源的效率悖论就非常重要。与那些将能源消费看成是“人们正常生活的例行公事的完成”的观点一样, 一项研究表明: 消费者固有的 (也就是非市场信号决定的) 习惯和偏好是人们选择能源低效的汽车技术的重要决定因素 (Almeida, 1998)。因此, 我们假设消费者是被“锁定”在他们基于感情的消费习惯中, 正好与 Simon 关于“人类接受来自正确社会渠道的信息和忠告习性”的所谓驯化概念相吻合。

如果我们从 *社会学习是人类最正式的学习形式* 这个理念出发 (Tomasello 等人, 2005), 而且认为理性是被束缚的, 那么对每条信息正确性进行证实就是不可能的, 我们在决策时使用的就是信息的“路径依赖”的某种形式。

遵循这条研究思路, 大量的研究文献表明, 我们的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习惯引导的 (以不假思索重复行为的形式出现), 而且不需要任何理性选择模式认定的认知过程的思考。这种决策“习惯”的明显好处是: 省去解决非常规问题所需要的资源, 因此, 也可以说是分配我们有限的认知能力的最理性方法 (Jager, 2003)。它将人从“所有的决策负担”中解放出来 (Berger, Luckmann, 1996)。

Tversky 和 Kahnemann (1974) 令人信服地证明, 人们使用各种认知和感情探试方法来解决不可能积聚所有可能信息的难题, 因此可能会做出迅速的、有时是无意识的行为性选择。人们的常规行为并不总是有意识的, 这个观点之所以重要, 不仅仅是因为它驳斥了理性选择理论, 而且还因为它指出: 炫耀式消费可能被夸大。Elisabeth Shove 和其他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 消费中不能忽略的部分是非炫耀性的。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绝大部分消费对他人乃至自己而言几乎是难以察觉的 (Jackson, 2005)。能源消费尤其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很难期待消费者在面对某些刺激 (不论是经济的还是信息的) 时有能力克制自己对能源的消费。目前, 基于碳的社会技术系统限制就是一个例证, 它通过结构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制度的力量——如道德规范、媒体等, 培养了消费者的选择。“心甘情愿”的消费者应被看成是被部分地“锁定”了 (Sanne, 2002)。因此, 消费者既不是完全理性的 (主流经济学意义的), 也不是无所不知的。

另外, 突出我们观点的“循环因果关系”理念强调, 尽管能源消费的选择受现存社会技术系统的强大影响, 但另一方面, 它们也加强和维护了这个嵌入性的系统。诚然, 如果诸如习惯这样高度自觉的行为在稳定的环境中毫无疑问是“程序化的理性”的话, 那么当条件和环境变化之大以至于要求不同的行为来创造更好的结果时, 习惯很快地会变成一种对抗变化的因素。Carrilo-Hermosilla 和 Unruh (2006) 借助“原创制度主义”来解释“递增收益和锁定概念的明显悖论”, 同样, 我们也把习惯看作是一个长期技术稳定的补充解释因素。

Paul David 和 Brian Arthur 一起开辟了对“锁定”过程的研究,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们就断定, “当存在强有力的技术相关性、规模经济效益、和因学习和习惯导致的不可逆转状况时, ”路径依赖就会产生 (David, 1985, 附加强调)。Barnes, Gartland 和 Stack (2004) 提出, 后来的关于“技术锁定”损害锁定过程中的“行为”部分的研究文献, 只采用了 David 和 Arthur 著作中的前两个论点。事实上, 有一种互惠的 (或称循环的) 强化形式存在。当社会技术系统培养人们行为, 让人们用特定的、符合该系统运作限制的方法培养习惯时, 这种互惠的强化形式就产生了 (Hodgson, 2004)。Hodgson 指出, “习惯是制度的基本构成材料”, 制度的存在使那个“相符的习惯进一步发展并在人群中得到强化。”这一点与下面这个观点不谋而合, 即: “消费者只会问能买到什么; 他们不会索要“技术上”不可能生产的东西。这些真实的限制最终反馈到人们的思维习惯中” (Ramazotti, 2007)。

我们必须注意, 上述观点与“机械的降低主义”相矛盾, 因为它相信个人和制度 (此处指社会技术系统) “相互构成, 相互制约” (Hodgson, 1997)。根据此观点, 目前基于碳的社会技术系统既限制又推动习惯的形成。它证实了在丹麦进行的关于能源消费的最新实验分析, 阐明了行为既有“雷同性和集体性”, 也有“多样性和个体性” (Gram-Hanssen, 2008), 凡勃伦也承认“不同的人养成不同习惯的容易程度不一样, 改掉不同习惯的意愿程度也不一样。”因

此个人习惯的分析也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之中。

以习惯形式出现的行为锁定对理解人们环境意识和关注虽然日益加强、但能源消费却仍持续增加的现象非常重要。的确，即使人们有采取某种行为（如吃得更健康）的意愿，但由于与现有的习惯相冲突（如去拐角的快餐店），还是不能立刻去身体力行。Verplanken 和 Faes（1999）使用了“逆意愿习惯”这个词，也就是说习惯越顽固，对意愿的行为影响越大。因而，Triandis（1977）认为“与行为的意愿相比，习惯是更好的行为预测”。有人（Verplanken 等，1998）用汽车和购买食品、看电视新闻和乘公交车（Ji Song, Wood 2007）为例，来证明用意愿是无法预测有顽固习惯的人的行为的。

习惯的自觉性质（也就是直接被环境刺激诱发的习惯性）可以解释这一点。习惯只需付出很小的认知努力就可以“战胜深思熟虑的行动”（弗普兰肯和伍德，2006）。这一点对当今社会尤为重要。当下社会，人们普遍感到时间的压力，因此更有可能采用“习惯”这样简单的启发式思维（Betsch 等人，2004）。事实上，当代社会的特点是个性化趋势与快速的技术和制度变化相伴而生，它孕育了一种信息过剩的感觉，这种感觉赋予习惯一种增强安全感和舒适度的要素（Lindbladh 和 Lyttkens，2002）。对那些害怕风险的人来说，由于自认为习惯可以让他们对后果和概率握有更大的确定性，因此被看成是更安全的。

习惯具有潜在顽固性的另一个理由是，短期报酬的强大诱惑超过长期利益。以吸烟这个坏习惯为例：尽管吸烟者知道戒烟可以避免潜在的健康危害（即长期利益），有强烈的愿望要戒掉，但仍不能放弃吸烟带来的快感（即短期报酬）。这种暂时的不对称也可以说明社会技术系统和制度对个人决策过程的影响力。如在金融市场上，经理们只关注“短期盈利而忽略长期增长和企业生存”（Barnes, GArtland 和 Stack，2004）。

最后，自我强化过程对依赖习惯的普遍习性和现有习惯的作用使习惯的普遍性得到强化。一方面，对信息乃至避开相矛盾信息的倾向的、前文提到的路径依赖，使现有习惯更加顽固不化。另一方面，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依赖习惯的人们用协调一致结构调整自己的认知观点、欣赏能力和正常判断（Lindbladh 和 Lyttkens，2002），这就让人更加坚信：依赖习惯就是依赖过去的经验和条件。再者，Veblen（1994）断定，如果习惯“主要是在生命的进程中深刻地形成”，或“与生活经历紧密相连”的话，那么它们的力量就更加强大。换言之，不仅现有习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顽固，依恋习惯的意向也更加强烈。Jager（2003）称之为“伴随的强化”。Veblen 对此也已经予以认定，认为“习惯形成的时间越长，习惯顽固性就越强。”显然这是习惯的一种锁定形式。

由此可见，促进可持续能源消费的政策既需要转向不可推卸的社会技术系统来做出方向正确的决定，也需要解构社会技术系统早已铸就的习惯（面对顽固习惯，仅仅加强环境意识和相关的意愿是远远不够的）。

四、界定“习惯”并分析其对行为的影响力

在这个阶段，有必要为习惯找出一个“试探性的”概念定义。按 Verplanken 和 Aarts（1999）的说法，习惯可定义为“对特定提示已经形成的一连串习得行为，具有实现某种目的或结局的功能。”请注意：这个定义明确地将重点放在习惯对行为的干扰上，而不是习惯对意愿本身的影响上。后者是像豪治森那些“老制度经济学家”关心的焦点，他们把养成的习惯看成是“新意愿或信念的潜在的基础”（Hodgson 2004）。根据这个观点，“习惯”一词还应该包括思考的习惯，因而也是反思和非反思行为的再生基础。豪治森视习惯为习性的看法很有意义，因为它“兼具互动的和进化的”思想（Hodgson，2004）——因为人虽有社会构成属性，但禀性和志向却大不相同。这再一次说明我们的以个人与人口之间的循环概念为中心的分析框架对习惯的分析是恰当的，采用前面提到的 Gram-Hanssen 的方法是正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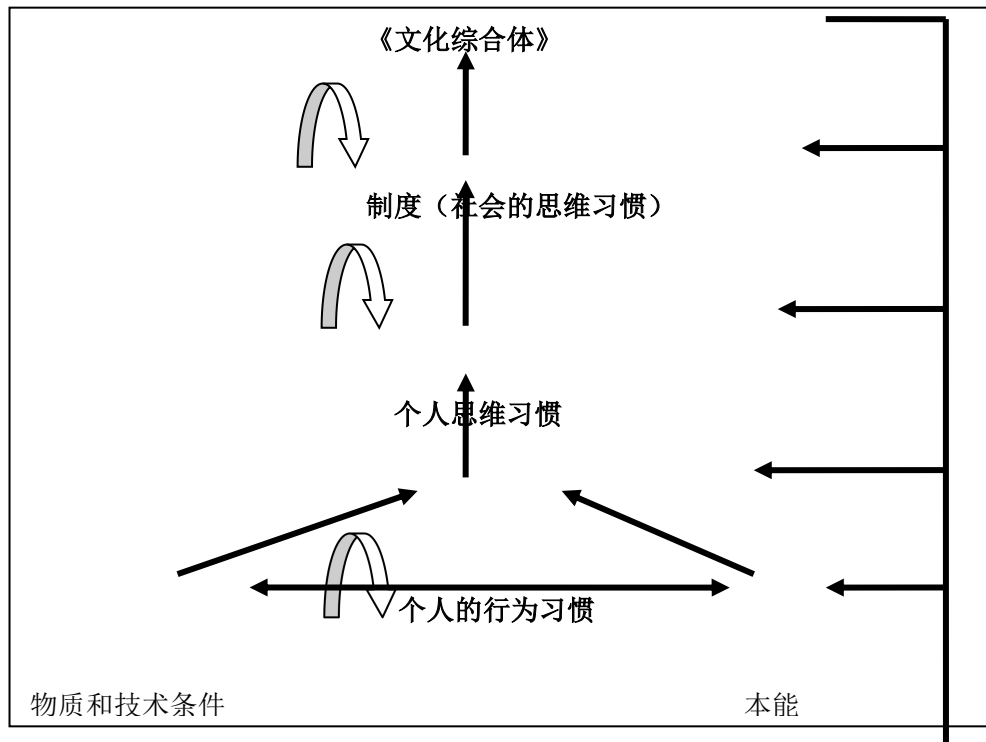
Veblen 提出的“习性”概念对研究能源消费深具洞察力。如果能够令人信服地论证每个人都有习惯的话，那么，习惯作为决策的一般性战略，人们对其态度就各不相同。这一点 Gram-Hanssen 进行的量性分析结果有明确的结论。

然而，在下一个部分，我们只探讨 Verplanken 和 Aarts 的“习惯”概念。因此，就 Hodgson

描述的习惯而言，我们只考虑由“思想习惯”引发的、作为“经验过滤器”的非反思行为。换言之，Hodgson 的习惯观点指的是以习惯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一连串的学习行为”。这样，我们就接近了这么一种观点，即：“习惯性”不是习惯行为，而是一种社会机制。

行动和思想之间的这种二分法对更好地理解“习惯”这个有些含糊不清的、多层含义的词汇非常重要，它可以让我们对能源消费的动因有更清晰的了解。这种澄清已不新鲜，因为 Veblen 早已将“思想习惯”与“生活习惯”明确区分。后者与 C.S.Peirce 界定的“行动习惯”同义，以为“行动规则”允许“用有效的方法应对熟悉的环境”（Brette, 2004）。Waller（1988）有这样的归纳，“与 Peirce 截然不同，Veblen 关注的是习惯的社会层面而非个人表现层面。”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习惯并入到更宽泛的发展分析框架中，因为“思想习惯是生活习惯的结果，”它本身也是“技术的间接产物”（Veblen 引自 Brette, (2004,253)）。如上所述，既然社会学习是学习的主要形式，那么两种习惯形式都可以代代相传，而且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没有直接接触的情况下，人们仍可能养成与特定的物质与技术环境相融合的习惯。”（Brette 2004）。如果我们再补充循环因果关系，就可以得到一个习惯（即“行动习惯”，稍后将进一步阐述）、制度（即“思想习惯”）与更广泛的“文化综合体”之间的正面反馈过程，这个理念与前述的社会技术系统和图 1 所示的 TIC 类似。

图 1. Veblen 的制度自我强化过程



资料来源：Brette（2003；2004）

强调习惯在调解行为中的作用并没有给行为因果关系中的控制或深思熟虑过程留下更大的空间，也没有暗示自动的和控制的行为过程之间存在明确的界限。根据 Damasio 的研究，人类大脑皮层存在相连性。显而易见，思维过程通常是自觉和控制态度的混合（Bargh, 1996；Betsch 等人，2004；Jackson, 2005）。事实上，意识和审慎伴随自动性形成的整个过程。

再者，既然习惯是通过学习获得的，由于自由的意志对记忆至关重要，因此习惯最初必须经过深思熟虑。其实，经常被引用的“驾驶的隐喻”最完美地阐明了这个道理。虽然有经验

的驾驶员在换挡时不加思考,但这种认知性的自动行为“经过长期的学习过程,在此期间动机的作用绝不可忽视”(Lazaric, 2007)。如果消费者的行为经常受发生在意识之外的过程的调解”(Chartrand, 2005),那么,它有时也可以被认定为无意识地求助于先前有意识的评价。与 Dopfer (2005) 提到的关于感情的句子相呼应,当依赖习惯的一般意向被认为是“习惯性智力”的一种形式时,我们就获得了“智力习惯”。

这就证实了 Jager (2003) 描述的习惯养成的三个阶段。他认为某种行为的最早表现是有意识的——不论是通过深思熟虑、学习还是模仿;然后,第一阶段是最早表现的、信息收集的认知过程;紧接着是将加工过的信息转化为程序化的实践形式(必要的努力在递减)的第二阶段;最后,第三阶段指的是行为上升到习惯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

然而,从控制到自动,习惯离自动性明显地越来越近了(Jager, 2003)。尽管我们可能知道自己在依赖习惯,也能改变这些习惯,但我们却依然故我,不费所思。习惯显然与纯粹的自动行为不同,后者是以感情为基础的反思型的行为。因而我们必须坚信:习惯的力量取决于“行为自动化的程度,行为在不加思考时表现出的程度”(Jager, 2003)。由此可见,习惯不应被简单地等同于过去行为的重复。Verplanken (2006) 认为,“虽然重复是养成习惯的必备条件,但重复本身并不重要。”

习惯除了具有必要的“重复史”外,它最关键的特点是自动性,或更精确地说是“在遇到特定提示时行为的自动引发”(Verplanken 和 Orbell, 2003)。换言之,假设一种行为经过令人满意的重复后形成习惯,而且与该习惯有关的目的也被激活,那么,某种特定提示的出现就会自动地引发习惯性行为。凡勃伦也提到“习惯是对某种刺激的反应方法”这个事实。

根据 John Bargh (1994) 的研究,自动性具有四个方面的显著特点,或称之为“自动性的四骑士”,即:缺乏控制、缺乏意识、追求效率(节省与其它目的有关的思考力)、缺乏意图。Verplanken 和 Orbell 证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习惯更容易表现自动性的前三个特点,因而可以区分不同习惯的顽固性。比如,虽然原则上习惯是可控的,但要克服像吸烟这样的顽习仍然很困难。Dijksterhuis 等人(2005)和 Chartrand (2005) 提供了充分的、纪实性的证据证明了消费者行为过程包含的最低意识。关于习惯的非意识特征,情况必须符合这样的条件:如果习惯可以变为“反意图的”,那么它具有功能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它具有意图(Polites, 2005)。总之,这就再一次说明习惯并不像反思型行为那样纯粹是自动的。

五、结论:克服非可持续能源“习惯”的必要性

从我们的分析视角看,最重要的问题是分析能源消费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于习惯性行为。显,这是一个实验性问题,但其根据是 Jackson (2005) 确定的三个条件——参与的程度、可视的复杂性、和限制的程度。我们可能怀疑这部分如 Shove (2004) 宣称得那么重要,其实,人们日常讨论的能源消费可能并不比其他决策更重要。根据 Amos Tversky 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可能采用简单的启发式工具(如习惯)。诚然,与日常能源消费相关的决策任务由于并不很复杂,因此不需要太多的认知努力。当今社会的局限(时代压力感乃至信息过剩感)最终导致人们依赖习惯。这意味着日常的能源消费行为并不需要太多的、有意识的努力行动,就像 Kremers、van der Horst 和 Brug (2007) 所列举的关于青少年对食品消费的例子一。在 Schafer 和 Bamberg (2008) 看来,伴随营养和活动的能量使用是“很难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行为形式”。一项对家庭能源消费的调查对此给予证实,从该调查中吸取的教训是:那些“妨碍人们采取(保护环境)行为的”、“让人们做出与自己意愿相反而且没有意识到的”习惯,事关重大(Martiskainen 2008)。

家庭能源消费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可见性,正如我们在第四部分提到的那样。这暗示着人们在消费能源时并不考虑自己行动对环境所产生的远期影响。这就是能源领域里的非持续习惯。

家庭能源消费的习惯很有可能限制激励措施的效果,因为这些措施并不解决行为表现的

环境和社会以及结构影响力对习惯养成的作用。例如，信息宣传活动的效率由于上述具有顽习的人们表现出的“确定的偏见”的存在而大打折扣。有效的能源政策则应该针对这些非可持续性习惯的根治为目的而制定。习惯定义本身就让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克服现有习惯需要改变环境启示和/或引导人们审慎思考，同时还需要时间和重来促成习惯性行为的改变。

既然习惯被看成是由稳定的、表现环境诱发的自动启发，(Dijksterhuis 等人, 2005; Chartrand, 2005; Wood 和 Guerrero Witt, 2005), 在能源消费领域中分析习惯引发的启示就成为根除现有习惯的第一步。正如 Verplanken 和 Wood 所述, “习惯对环境的依赖代表了一个重要的易损点。”根据 Ji Song 和 Wood 的说法, 主要的环境提示包括物质环境、社会环境、暂时的视角、任务的定义和先前的状态。

就家庭能源消费而言, 地理位置是一个重要的环境提示。因此, 如果支持性信息具体瞄准的是新居民(他们以前养成的习惯随着地理位置的变化已经被打破), 那么旨在改善能源效率的经济激励措施对这些新居民就比对那些老居民更有效果。Wood 等人的证据支持这个论点, 它让我们看清地理位置的变化是如何导致决策与意愿而非习惯相一致的情况。

除提示的重要性外, 我们也理解短期报酬与“暂时不对称问题”对习惯的顽固性的解释。除了瓦解习惯的表现环境, 另一个可能发挥效力的政策措施是减少对习惯性行为的直接报酬。加格提供了类似的减少报酬策略的例子, 如在手指甲上涂上令人作呕的东西来避免人们咬指甲、或服用抗酒精药丸。

虽然在能源消费领域里并没有明显的同类策略, 但是决策者可以求助于他们的对手, 增加相反行为的报酬。加格提供了这样的策略, 他提到: 荷兰为了奖励正确垃圾处理习惯, 实施了在路边安放垃圾网的政策。提高对相反行为的报酬似乎为我们建立可持续性能源措施提供一个有意义的基点。由人们自愿参加的布鲁塞尔能源挑战调查的受访者的回答, 肯定了这种策略的有效性。正是因为“挑战”一词本身的含义使这个政策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受访者认为: 挑战的概念有利于促进人们改变自己的日常行为。事实上, 承担义务的策略(如布鲁塞尔能源挑战)加强了“因实现个人价值而得到的自我满足感”, 因此也增加了“不行动的成本”。

根据社会身份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的预测而建立的另一个策略是: 利用比较性反馈。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对一家冶金公司的两个单位调查时(Siero, 1996), 研究人员通过增强动机来提高业绩。在第一单位中, 员工接受关于能源节约的信息, 并要求他们制定目标并接受个人能源节约行为的反馈。第二个单位的员工也同样, 唯一不同之处就是他们还能接受到另一个单位员工表现的信息。不出所料, 接受到比较性信息的员工节约的能源更多。有意思的是, 作者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 即: “行为变化的产生几乎与态度变化无关”。(Siero, 1996)。

最后, 我们必须回顾习惯产生的环境。牢牢记住这一点: 要根除一种非可持续性能源消费习惯, 显然仅完成了第一步, 决策者必须要确保新的(更加可持续的)行为要先经过检验, 然后付诸实施并长期保持。正如 Matthies、Klockner 和 Preibner (2006) 所指出的那样, 作为杰出习惯的临时性的应景改革可以带来新行为的长期变化, 但对这个新行为的评价必须是正面的, 这就要求内部和外部的决定因素都有利于这个新行为。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之内, 这显然意味着: 外部环境(即广泛的社会、文化、制度和技术方面的环境)必须纳入考虑之中。政策的目的是帮助消费者“摆脱他们的知识强加于他们的限制, 这种知识是通过他们学会的思维习惯获得的。”

译者单位: 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邮政编码: 116025